



张鑫 展会服务员



谭义雄 餐饮店临时工



宋紫莹 展台促销员

百元半月 挑战不可能

本报记者 郢阳

7月的最后一天,怡人的蓝天白云,阳光斜照虹桥火车站,来自湖北科技学院的6名大学生在车站前露出了笑容。

他们要踏上归程了。这笑容里,有思念、有喜悦、有自豪,更多的,是一份庆幸。

半个月前,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,正午的骄阳似火,炽热又严酷。陌生的城市,每个人只有100元启动资金,15天内必须自己想办法赚钱维持生活,不能接受任何非劳动报酬的资助。

100元,上海,15天,当这3个词语联成一道算术题的时候,答案似乎能脱口而出——不可能。



■厚厚一沓名片都来自湖北科技学院“生存大挑战”(上海分队)队员面试过的单位
本报记者 徐程 通讯员 李鑫 摄

这个暑假,湖北科技学院“生存大挑战”派出61名学生奔赴上海、合肥、杭州、广州等全国十城,郑皓宇、谭义雄、宋紫莹、沈杨慧、高铭、张鑫的目的地,是上海。

意外之喜

“生存大挑战”不是个新鲜词儿。2007年夏天,湖北科技学院13名大学生前往长沙,用100元挑战生活15天,举国关注。16年后,活动重启,又一批青年走出象牙塔,直面社会现实。

申城盛夏的白太阳,热辣辣地炙烤着大街小巷。舟车劳顿,抵达上海后,郑珍向学校申请,为2个小伙伴、4个姑娘在宾馆开了3间房,好好洗漱一番。大学生们不会想到,这是未来半个月里,睡得最安稳的一晚了。

那天傍晚,郑珍带着他们来到了外滩和南京路。黄浦江霓虹流离的波涛,在沉浮间给人以错觉:上海这么繁华,总会有机会的。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。通过各式App和小程序,他们早早看好了岗位,约定一到上海就去面试。

除了打卡城市地标,外滩之行更是一种考察——万一没找到工作,摆地摊能养活自己吗?很遗憾,这扇窗,被关上了。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依旧叽叽喳喳地兴奋着、好奇着,他们不像老师想得那么远,天真地觉得,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或许不难。

现实给他们上了一课,但挥大棒前,却先给了年轻人一颗甜枣儿。大家最初的想法不约而同:餐饮业。还别说,真有人找到了着落。“唯二”的男生谭义雄被徐汇一家小龙虾烧烤连锁店看上,下午4时上班、凌晨2时下班,包吃住,不过面试时,没提工资。

算是“开门红”,郑珍陪着谭义雄把行李搬去了那家店的员工宿舍。进门的那一刹那,仿佛一颗瑟缩于大上海角落的洋葱,被剥去层

层叠叠的外衣,露出辛辣的真实内核——逼仄的空间,长着霉斑的墙纸,上下铺的床位,堆着电饭煲和洗漱用品的水池,还有大摇大摆爬过的蟑螂……

安顿好的当晚,谭义雄向随队的两名宣传员提了个请求:能不能来他们下榻的酒店“蹭”澡。郑珍虽然不忍心,但还是拒绝了他。

年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,还是很强的。过了几天,郑珍再去探望的时候,谭义雄已经干得有模有样了。老师向餐馆打探,都对这个新来的临时工赞不绝口。

“他有问过我工资的事儿。我告诉他,最开始没提的话,过程中也不要想了。能包吃住,已是意外之喜。”郑珍说,“更何况,‘生存大挑战’本身也是一种财富,教会你面对挫折,懂得担当。”

谭义雄不知道的是,选择了他的这家餐饮店,老板娘是咸宁人——湖北科技学院的所在地。打工结束的那天,谭义雄还收到了1300元的工资。当然,这是后话了。

直面现实

谭义雄的小伙伴们,就没那么顺利了。

郑珍拿出厚厚一摞名片,“这都是孩子们面试过的单位”。

她还记得那个中午,自己和两名宣传员去吃饭,路上遇到了工作仍没有着落的大学生们,便邀请他们一起去。走了一段路,年轻人还是和郑珍道别了。“老师,我们吃不起。”他们难为情地飞快跑了。郑珍的目光跟着他们的身影,最终停留在街角的一家包子铺。

“我们在面店里,听到老板说,这几天有5个年轻人来问招不招短工,我一想肯定是他们。”郑珍说着,都笑了。或许是受到谭义雄的启发,“大本营”周围的餐饮店,剩下5人都跑遍了。

开学要升大三的郑皓宇是体育生,在出发前的设想里,在魔都的

15天应该是充实的,他甚至觉得,应该可以发挥专业所长,在球馆里找到一份教人羽毛球的美差。“可没想到,在陌生的城市,原来找份工作那么不容易。”大男生嘟囔着,“甚至连洗碗工都不要我们。”

见同伴吃住有了着落,作为这支队伍的队长,郑皓宇有些羡慕,有点嫉妒,但更多是着急。那两天,大家在烈日下暴走六七个小时,可结果都是失败,持续的被拒绝让大家都有些泄气。

“人家不要短工,要有经验的,我们都不符合。”他叹了口气,那几天,花出去的每一元钱都像是割肉,让他心疼又无奈。

年轻人的脑子转得快,队里的一个姑娘将大家拉到了兼职群里,发现了另一条“生财之道”——群演。“可群演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前一晚我们应了下来,第二天6点就要到现场,迟到三五分钟,剧组就不要了。”郑皓宇回忆。

那天,剧组在没沟通的情况下在他脸上抹上血浆,让他扮演死尸。“我觉得挺晦气。”剧组额外包了个10元钱的红包,大家不欢而散。

来上海第七天,郑皓宇和队里一个姑娘找到了一份次日在顺丰浦江中转场的活儿。地方偏,开工时间又早,两人决定夜里就出发,到了浦江镇后,要解决住宿的问题,打开手机软件,动辄数百元的宾馆吓退了他们,目光逐渐放远,最终落到了仁济医院(南院)上。

没错,两人最初的选择是,在医院的急诊将就一晚。可离医院也还有个二三公里,路上只找到一辆共享单车,郑皓宇让姑娘骑着,自己在一旁跟着。

可急诊室怎么会是能让人安歇的地方?明亮晃眼的灯光,步履匆匆的人们,滴滴叫着的监护仪器,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凝成的压抑感。没待多久,两人还是退了出来,寻觅了间网吧将就了一夜。

“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了晚

上8点,一刻都不能歇,快递一车一车地来,因为我们是临时工,还会被正式员工责难。”郑皓宇的回忆,带着委屈和无助,“下午的时候,我都想放弃了,可最终还是撑了下来”。

那天,他拿到了180元的日结工资,姑娘是160元,是那段日子里单日最高的。

居无定所

来上海前,高铭是很期待的,甚至第一天和大家一起去找工作时,她还觉得“有点儿像去旅游”。

到了晚上,当现实问题摆在姑娘面前,她就笑不出来了:睡哪儿?她们先去了肯德基,趴了片刻后发现并不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,在快要打烊时退了出来;又来到了海底捞,儿童游戏区倒是能歇歇,也不会被驱赶,可女孩子脸皮薄,睡了一晚便不好意思再去了。

“酒店楼下一般不都有沙发吗?我们也靠着休息过一晚,但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就会被服务员请离。”高铭苦笑着。几人住得最久呢,是高“大本营”不远的上海电力医院。“晚上急诊还开着,不会关门。”这是家综合性二甲甲等医院,不会太忙碌,空调也能阻隔户外的闷热,暂时成了“无家可归”的大学生的庇护所。

不过,睡在急诊大厅也不是个长久之计,很快被保安发现,让她们离开。几人合计,却再也找不到如此“高性价比”的地方了,只好“打起游击”,前脚从正门离开,绕一圈从后门进去;一楼躺着可能成“显眼包”,那就往二楼三楼跑……

“白天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打零工,体力消耗都很大;晚上她们也睡不好,几乎隔一会儿就被弄醒。”大学生们的境遇,郑珍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可规矩是死的,她也无能为力。唯一能变通的,是年轻人居无定所时,让大家晚上在酒店里洗个澡后再去找歇脚之处。“这么热的天气,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汗,如果连澡

都不让她们洗的话,晚上更加休息不好了。”她这样解释。

高铭记得,“兜里”最少的时候,只剩下不到70元钱——那是来到上海的第三天,找不到工作,交通和吃又没法省,“能吃便宜的就吃便宜的,能不花钱坚决不花钱”,她这样描述。这个学艺术的“准大三”姑娘遭遇过画馆老板“画大饼”后没给工资;也在找到话务员的工作后勇敢地为自己多争取了10元的报酬……“哪怕日子稍微‘富裕’点,却也动过犒劳自己一下或是住得好点儿的念头。”

“回家之后一定先好好洗个澡,然后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到自然醒。”她笑着说,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经历,自己会选择一个网络流行语:泰酷辣!

四 苦乐年华

除了负责守好学生的安全底线,郑珍在这半个月里,更多是“旁观者”的角色。“参加活动的同学都是经过笔试、面试筛选出来的优秀学生,有些还是各自院系的学生干部。”她说,“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老师,但在社会上只能靠自己。”

在她看来,这15天带给大学生的,显然不只是“活下来”这么简单。郑皓宇去顺丰干苦力前,她就打好了“预防针”,“别看你是在体育生,这个钱不好赚,你得有心理准备”。当年轻人坚持下来,拿到劳动所得后,郑珍又告诉他们,底层劳动人民努力地为生活打拼,更为城市流畅运行提供便利,有了切身体会更该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和尊重。

高铭曾去一家餐饮店应聘洗碗的岗位,但对方婉拒了她,“想找个有经验的”。郑珍知道后,给了姑娘另一番启示。“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?”她说,“哪怕你告诉老板,我免费为你打一天工,你看看我洗的效果再决定。或许最终还是没法留下,但至少你尽力了。”

这座城市,还是对远方的来客,善良而温存地敞开怀抱。女孩们会来郑珍的房间洗个澡,打扫房间的阿姨了解了大家的故事,细心的她有一天为晚归的两个姑娘下了热腾腾的面条,年轻人蜷缩在楼层角落打个盹时,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惊扰他们……

品味过焦虑、无助、绝望、惊喜、温暖,郑珍反倒觉得,这15天里能“赚”多少,没那么重要了。“酸甜苦辣皆滋味。初出茅庐的他们脱下了‘孔乙己的长衫’,懂得警惕社会中的险恶,懂得发现社会的善美,这段日子不仅是生存的挑战,更是心态的试炼。”

或许多年后,踏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还会抽空做客上海,打捞青春记忆,致敬这座城市的包容,铭记渺小但倔强的自己。